

莫斯科“偶遇”的葬礼

曹景行

马克·扎哈罗夫在莫斯科去世了，他的中国学生查明哲导演几天后才知。中国媒体上找不到什么报道，还是查导的朋友在中央戏剧学院一处布告板上见到有人贴出消息，拍照传给他。我们却有机会采访到了扎哈罗夫的安葬，10月1日下午在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，正好遇上。

上午结束与俄罗斯社会科学院学者的座谈，赶往下一个地点新圣女公墓，天雨车多，下午两点多才到。入口处似乎有点不寻常，有警车和警察，有电视台记者摆着脚架和摄像机，还有人手持鲜花在等着什么。里面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、重要活动。望进去，主要通道的路口聚集着好多人，红色的遮雨棚下一片黑色的衣着，那儿应该在举行葬礼。

往里走了没几步，就被一名女警卫挡住，要我们绕道。往左不远处是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的三色国旗墓地。我们从墙边转了个圈到了葬礼的另一侧，那边也停着一排黑色豪华汽车，还有一群保卫人员。见到一位女士走出来，俄语专业的刘方洲上去打听，知道今天下葬的是俄罗斯导演扎哈罗夫。她说：“我来，因为热爱他！”

莫斯科的4G信号算是不错，中移动全球通的联网能力也够强，即使在开闭的墓地当中，我们用手机还是很快就找到不少俄文和中文的资料。马克·扎哈罗夫是莫斯科戏剧界五大名导演之一，9月28日去世，享年86岁。上午在他主管和打理了四十多年的列宁共青团剧院举行了遗体告别，下午移到新圣女公墓落葬。

对于我们的采访课程来说，能够遇到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。尽管有点突然，但如何很快做好准备进入状态，如何在有限时间陌生环境中设法获取必要、足够的信息素材，拿出合格的新闻报道，正是一次很好的现场实战演练。一转眼，会俄语的学生开始采访前来参加葬礼的仰慕者，手持摄像机的学生则绕到人群前面，在圣咏的音律中记录安葬仪式——

我们“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重大事件多语种全媒体报道团”课程始于2008年，今年已是第九次组团，二十位全校挑选出的学生连同四位老师。这次以俄语专业为核心，中俄建交七十周年为主题，两个星期飞机加火车穿行俄罗斯从东到西五个主要城市。10月1日在首都莫斯科，我们这一组选定的采访目标是闻名世界的新圣女公墓。

一个地方的公墓就是历史的记录、集体的记忆，以往几次课程中我曾与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



笔会

无声

(油画)

张春华

雕像与石碑

邢小群

在国外旅游，常常看到纪念已故文学艺术家的雕像。从西班牙马德里的塞万提斯雕像，到波兰华沙的肖邦雕像，到芬兰赫尔辛基的西贝柳斯雕像，无不坐落在最醒目的位置，体现了那里对本国文化巨匠的崇敬。几个月前，我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，还见到作家、诗人阿利耶加的雕像，仅为头部，就有一人多高，脖颈如千年古树的根基，头发一团一簇，茂密的发丛中，布满了神态丰富的人物，原来，这些人都是他作品中出现过的形象，让我久久难忘。

我们过去没有在公共场所为已故文学艺术家立像的传统。在很长时间内，除了鲁迅，很少见到其他文学艺术家的雕像。近年来情况有所改观。许多地方重视打造本地旅游资源，纷纷为本土文化先哲树碑立像。其中一些作品形神兼备，成为新的人文景观。

前不久，我在山东日照银河公园，看到了一座为出生于日照的诗人牟宜之建立的诗碑。碑高四米，上面是诗人的头像浮雕，下面是他20岁写的诗《少年行》：“少年颇负俊偶名，略触谈锋举座惊。足涉八荒志在远，胸添五岳意难平。王侯将相于无意，农工商各有情。踏平坎坷成坦途，大道如天任我行！”在山东乐陵，这位诗人的陵园也有一尊石像，背后是书法家李铁城书写的另一首诗《从延安到冀

学生一起去过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和蒙帕纳斯公墓，去过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雷科莱塔国家公墓，那儿葬着艾维塔“庇隆夫人”。这次时间再紧也不应该错过新圣女公墓，有幸我们还“偶遇”了扎哈罗夫的葬礼。说起扎哈罗夫，二十多年前与查导同时任在莫斯科学戏剧的上海资深媒体人邵宁，用了“如雷贯耳”一词，认为当年他同他的列宁共青团剧院在莫斯科和俄罗斯都首屈一指，地位崇高。中国知道他的人并不多，我们都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；他只来过一次北京，1987年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了苏联话剧《红茵蓝马》。但是他对中国戏剧后来的发展却有特殊的影响。

第二年，作为他副导演的查明哲在中央戏剧学院学报发表了论文《扎哈罗夫之谜》：“我们突然发现了自己工作中的一个疏漏：竟一直没有对扎哈罗夫——近年来在苏联最有影响的大导演之一，进行研究和介绍。他对我们来说是个谜……”

扎哈罗夫带来了观念的冲击。在《红茵蓝马》中扮演列宁的张秋歌那年才二十三岁，身高近一米八，一点也不像列宁。但扎哈罗夫就是反对演员从外形上追求与角色相像，要求“非肖像化”。他用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话说，“列宁的思想就是形象”。演

出开场了，张秋歌就穿着夹克衫和牛仔褲从观众席跳上舞台，以第三人称进入角色，开始还感到突兀的观众，不用太久就接受他就是列宁。

为扎哈罗夫当副手的查明哲从旁观察，发现他“工作起来像一团火，生活中像一个猜不透的谜”。他传授的舞台秘诀是：保持观众的欣赏兴趣甚至吊足胃口，但是永远不要让他们猜到下面你给他看什么、出现什么场面。查明哲从中发现，导演艺术的关键就是把握戏剧节奏、营造戏剧氛围、设计矛盾冲突、呈现生动的细节。

1991年查明哲赴苏联攻读博士学位，被扎哈罗夫留在莫斯科成为入门弟子。那四年正是苏联解体的动荡时期，老百姓普遍承受着体制变动带来的苦难和压力，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艺术、对文化的热爱、尊重与追求，莫斯科到处都有演出，剧场里晚晚火热爆满。回国前他去剧院同导师告别，临分手时问了一个想了很久的问题：“戏剧对俄罗斯人究竟意味着什么？”

这个故事查明哲后来讲过好多次，在中国戏剧界已经广为流传。10月19日傍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后台的化妆间里，他给我们再次回忆了当时的情景。扎哈罗夫说了一句“你问得很好”，却没有马上回答。两人走出剧院，扎哈罗夫在台阶上停了下

来，若有所思看着夕阳，旁边的教堂正好传来钟声。这时他喃喃自语般地说了一句“剧院就是教堂”，既回答了学生最后的问题，又像是给自己一个答案。

戏剧和剧院给俄罗斯观众带来了精神的升华，而对扎哈罗夫来说，那儿就是他的天堂。但10月1日那天他离开了剧院，来到了公墓，他的另一个天堂。这块新的墓地就在新圣女公墓的当中，上面铺满了鲜花，他的黑框大照片搁在棕黄色的东正教十字架前，暂时代替未来会有雕像。往左几十米就是俄罗斯文学和戏剧巨匠契诃夫的墓地，对面则是果戈理，又一位俄罗斯大文豪。夜深人静时，他们会谈论些什么？

葬礼结束了，参加者陆续散去，也有人留在细雨中整理周边的好多花圈，最庄重醒目那只绸带上写着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字样。深秋的莫斯科很美，尤其在新圣女公墓里面。金黄色的树叶一半铺在地上，另一半还挂在树上，不时会飘落到两万多座墓地上。从10月开始公墓提前到五点关门，管理人员催促我们离去，时间太短只能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。

第二天翻到《俄罗斯报》，关于扎哈罗夫葬礼有大半版的报道。俄罗斯人很尊重艺术家和文化人，尊重这位戏剧导演，无论生前还是身后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还是个儿童，有关那时一些吃的记忆仍未褪去，有些往事至今回味无穷。那时我的外公还很健朗，他是当家人，客厅里挂着一本大日历，一些时令节气日，他都用笔圈起来，到了这一天，家里的吃食便与往日有些不同。他还有一本簿子，专门记录一些故去亲人的忌日，以及他们生前有关吃食的喜好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给我的外婆过生日。周年前几日，外公就要叮嘱家人准备起来，主要是采购一些鸡鸭鱼肉等荤菜，素菜自家田里有。外公在食材的选用和加工上很考究。比如做红烧肉的肋条，要取哪段，吃口才好；馄饨芯里的肉，要用梅花肉，才嫩。这都有讲究。有的菜他担心别人做不好，就要亲自下厨。有一次我见外公从厨房出来，好像不开心，后来才知道，新米帮佣的阿姨，把做红烧肉的一块肋条，一块块切得不整齐，不入外公眼。外公叹道，落手太快了，实在不像样！我当时想，只要烧得好吃，不整齐也没关系呀。好多年后读到孔夫子“肉割不正不食”句，想起外公，不由会心一笑。或许这里有对食材加工采取粗暴态度，缺乏专业精神的一种不满吧？

外婆的周年日这天，亲朋好友都来了，他们携带着不同的礼物，都是吃食。有桃红纸裹着的云片糕，有竹篾编的小黄篮里盛着的苹果或生梨；有的拎一盒蛋糕，纸盒里装有八只小蛋糕。这些礼品的包装都很简单朴素，用今人的眼光来看，未免有些寒酸。

烧过香磕过头，宴席开始。客厅里摆了八张八仙桌，孩子们另有小方桌伺候。上桌的菜，都用瓷碗瓷盆盛放得扑扑满。有刚刚从蒸笼里端出来，身上冒着汗似的红烧肉，有切得如铁砧砧大小般的咸肉，鸡和鸭都是整只上桌。鱼要么是糖醋黄鱼，要么是大汤黄鱼，带鱼是不上台面的。有时候还有走油蹄髈、爆炒鳊丝、白切山羊肉、草头圈子、河蚌炖豆腐等。素菜则是当季田里的时令菜。菜虽然丰富，但只数通常不会过十。

五十年代的生活想来还比较安逸，故此大人们常借着由头，花心思操办一些吃的事情。这些事情做得很隆重，会让我这样的小孩认为，先人的纪念日或节气日，就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多吃几样好小菜。

那年月虽是食材不缺，但人们多是崇尚节俭，平常餐桌上，也就两三个菜，即使家宴多下来的剩菜，明后天会烧烧煮煮继续吃。人们对吃饭有一种恭敬的态度，我们家对孩子也有很多规矩。比如，吃饭时一定要捧住饭碗，吃完后碗里不许剩饭粒，搦菜时筷子不能在菜碗里翻来翻去，饭桌上不能喧闹等等。

五十年代末，副食品供应一下子紧张起来，手头有钱也买不到货，但正所谓“乍贫难改旧家风”，老外公一年里还是要勉力操办几次家宴待客，只是台面上少了荤菜多了素菜，而亲戚们仿佛比之前来得还要多，多是为了能满足一下空虚的胃。

六十年代开端，各种吃穿用大都要凭票供应，日子变得艰难，外公已经去世。我和弟弟妹妹们渐渐长大，胃口也变大。以往家里惯例，烧饭总要烧烧点，以备客人突然上门有饭吃。但此时只能是候分克数下米，每顿饭吃得精光，还觉未吃饱。父亲买了一些搪瓷小碟，菜出锅了由我平分到每个碟子里，分菜人最后一个拿。这是一项考验眼力的活，我的工匠精神，常让弟妹们围绕着分好的每碟菜，左顾右盼，选了这碟又觉得那碟多，真是难分伯仲。

那时家里还有保姆，她的口粮要大家分担，为了增加一点吃食，有一次不知父亲从哪里搞来了一小辆南瓜，堆了半间小屋，于是餐桌上顿顿就有南瓜。有一回，母亲做了一顿别样的晚饭给我们吃。把南瓜切成小块多加水先煮熟，接着再放一块老豆腐和一把切碎的卷心菜，就骑着自行车带着下水穿的橡皮衣，到郊外野河浜里去摸鱼，改善家里伙食。他家屋子小，夏天的晚餐常常放在屋外。我两个弟弟看到了常回来向我妈通报：他家今天吃螺蛳了！他家今天又吃鱼了！有一天夜里，这位炉前工来敲我家门，送来几条河鲫鱼，我妈大为感动，要拿钱给他，他连连摆手说：阿嫂，我不能收你钱的，收了钱我就变成投机倒把了！

我妈收了鱼，作为回礼，后来做了一些菜肉圆子，端给他家。那天傍晚，野在外面的两个弟弟冲进家门嚷，你们快去看，阿三阿四打起来了！我出去一看，他们家最末两个相差一岁的男孩扭在地上滚来滚去。原来我妈给他家的圆子是按照他家人口每人两个，这天因为阿四晚到家，阿三就把阿四的两个圆子偷吃掉一个，阿四知道了，气得就在阿三的腿上咬了一口，阿三被咬疼了，打了阿四一记耳光，这就炸了马蜂窝，边上人怎么也扯不开这对冤家。

七十年代，人们开始意识到抓生产的重要性了。物质供应虽仍要凭票，但民间多了偷偷交易的所谓“黑市”。黑市上只要多花钱，也能买到猪肉禽蛋等副食品。我家有个亲戚是北京人，当时他家有个儿子正谈恋爱，那小子笼住女友的办法，就是让她常来蹭饭。而他母亲得知儿子的女友哪天会到，总要准备点肉，哪怕是一碗炸酱肉丝面。某天儿子携女友突然驾到，儿子见桌上没肉，就嬉笑着问他母亲：妈，今天卖肉的怎么没撞上您？他妈妈的幽默一点不输儿子，回答说：明天你爸发工资，后天就撞上了。这话传到我们家，让我们几个孩子经常学舌。

那时我家在六十年代被收掉的一份宅基地，也归还了我们。因为有了田种了菜，就常有亲戚上门，摘点菜带走。物质宽松了点，亲朋好友上门来，留顿饭也不再是很难的事情了。我父亲有个朋友，星期天下午常登门，我们几个孩子都爱听他讲故事说趣闻，他的故事往往讲到我家厨房飘出香味时就刹车了，然后起身要走。我们又哪能放他走？这样，每回他留下吃饭时总要念叨一句：哎呀呀，我又要拐饭吃了！

回味

徐慧芬

我记得有一次餐桌上有两样东西让这位爷叔赞不绝口。一样是油鸡糍，另一样是糟蛋。这是我妈到一家著名的南货店里买来的。两样东西都装在柜台上摆置的大玻璃瓶里，顾客携器具来零拷。鸡糍菌极鲜，浸在黄澄澄的油里，连油都鲜得要掉眉毛似的；糟蛋是用生蛋浸在酒糟里泡制，蛋将化未化，和白色的糯米糟混沌一团，呈现出讨人喜欢的奶黄色，醉人口眼。这两样东西若是搭粥吃更妙，后来市场上就不大见了。几十年后网购流行，我在网上买过一款号称是极品糟蛋，但这糟蛋已不是那鸡糍了，还买了一瓶标注原味的油鸡糍，舌尖上也已尝不出记忆中的味道了。确实，有些过去心心念念想吃的东西，如今到嘴已不觉其妙了。是现在人的嘴巴刁了？是食材原料不正宗？是传统制作工艺的失传？众说纷纭。

进入八十年代，改革开放万象更新。粮票布票等虽然还要用，但物质供应要比七十年代大大丰富了。人们的肚子里有了油水，粮食也就吃不多了。城市家庭几乎家家都有多余的粮票，街头巷尾就有一些农村来的人，提着竹篮里的鸡蛋，来换粮票。想来农村粮食还是紧张。后来国家经济形势全面好转，粮票一下子取消了，我家多出来的几百斤粮票全作废了。

那时我们兄弟姐妹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家里常有“毛脚”光临。有一天我弟弟的女友，在外参加活动，中午不想在外面吃饭，顺道往我家来了。晚上弟弟问我妈，依弄了点啥菜？伊吃得开心吗？我妈说，我看今今朝胃口挂了三把钥匙了！啥意思？弟弟很奇怪。我妈答：开心、开心、真开心！这三个开心，全赖那时家里有了一台叫“万宝”的冰箱，冰箱里存放了一袋生鸡腿。油炸鸡腿，是那年月上档次的

美食。到了九十年代，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已见成效。一切有关吃用的票证都取消了，副食品琳琅满目，各种进口商品也相继登陆，大小餐馆到处闪亮登场。大家开始讲究吃的质量，老百姓到大饭店吃饭也成了寻常事。样样东西买得着，这让我妈的厨艺大发挥，烹饪的积极性前所未有，餐桌上的丰富超过了五十年代外公在世时的风光。

时至今日，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已经不再为吃穿发愁了，即使收入不高的家庭，吃点荤菜喝点牛奶又有啥稀奇？在外作业的农民工、快递小伙，随便一顿盒饭，里面也有荤有素。这光景早已赛过从前穷人羡慕地主富翁的那句话——“地主家真有钱，他们天天吃饺子！”前几天我到菜市场买鸡蛋，一个摊位上，各种鸡蛋还有鸭蛋、鹅蛋、鸽蛋、鹌鹑蛋，样样有。我对女摊主说，你家东西真全啊，你各种蛋可以随便吃，让她说，做这个生意，俺早吃厌了……听此言，想从前，真让人生出不知今朝是何年之感。

生活富足了，浪费现象也跟着来。穷日子富日子都尝过吃的老妈，现在有人胡乱丢弃食物，总要叹一声：真罪过啊！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”，这样的古训，根植在她九十多岁的脑中。有时电视上看到国人餐桌上大肆浪费的镜头，老妈会很生气地斥道：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日脚好了了，开始作了！而后发出了这样的疑问：这样浪费下去，假如再来荒年灾害怎么办？现在世界上是不是人人都吃上饱饭了？问得好啊！今天的人，确实需要温故察今而望远。

之，每思兴筑石堤以防水患，而卒未能也。

自我民主政权树立以还，兴利除弊，不遗余力，对此攸关民生之举，莫能漠然置之？经详细勘察、精确设计，乃决计兴筑。赖本区行政专员牟宜之、本县县长尚明两先生之号召领导，与全体工作同志、群众团体之奋起努力，及民众之热烈拥护，遂于本年四月上旬，鸠众庀材，始兴工。民众莫不踊跃欢欣输财服役。历时三月余，值我抗战建国四周年纪念之日告厥厥成。此后，当可永杜水患，丰稔有期。乃举行盛会，以志不忘。与会民众举欣欣然有喜色，其乐从可知也。至沂、汶二河水利工程之全部兴修，则有待于异日。

大堤计共长五千零三十九公尺，土堤长四千七百三十公尺，石堤长三百零八公尺，石堤宽：底四公尺，顶一公尺，高六公尺，地基一千二百五十五方公尺。共需民工五万六千三百名，石工八千九百六十二名，用石灰八万七千五百十斤，费用币一万五千四百七十四元七角二分。

账目公开，精确到分，让人慨叹！这是万众同心、保护家园的见证，是抗日政府民主管理的见证，也是牟宜之等人廉政勤政的见证！当时强敌人等，环境险恶，施工条件简陋，现代机械设备根本谈不上，但工程设计之好，施工质量之高，管理之廉洁高效，仍然让人难以企及。

抗战期间，当地百姓为了保护这座石碑，用柴草掩盖了它。现在除了个别地方字迹不清，基本完好无损。大堤造福于民，这座碑也成了护佑百姓的圣物，当地举办喜事，常有人前来烧香，燃放鞭炮。

勒石刻碑，并非难事。留驻人心，才算永恒！

鲁边》：“月明却照汉秦关，回首微茫九点烟。事业尽抛豺豕尾，河山犹待伏龙肩。行间骑坐戎衣窄，酒畔谈兵战血鲜。鹤唳风声惊日夜，扬鞭策马驰幽燕。”豪气凌云的好诗与飞扬恣肆的书法，令人流连忘返。

牟宜之出生于1909年，逝世于1975年。作为诗人，其不凡的艺术造诣近十年才被社会发现，文学史家已将他与当代诗词大家聂绀弩并论。诗人生前不曾想到身后殊荣。1969年他60岁，在困顿之中曾写诗自况：“无诗焉能言吾志，有功岂必书之碑。”身后立碑塑像，不在他意料之中。

但是，他生前也立过一座碑，碑上无诗，却更有历史的分量。这就是位于山东东南的袁家口子大堤落成纪念碑。

此碑的发现出于偶然。就在前几年，一个朋友开车旅游，经过沂南砖埠镇袁家庄汶河岸边，发现一座石碑，好奇心令他停车观赏碑文，书有“袁家口子大堤落成纪念碑”，为牟宜之题写。

他将这一发现告诉了住在北京的牟宜之儿子牟广丰。牟广丰前去探寻。不想走近石碑时，遇到一位老人阻拦。老人神态非常警惕，问他要干什么？原来，有关部门正在当地修桥，老百姓担心施工部门将石碑挪作他用，自发组织看护。当地人知道来人是牟宜之的儿子，马上变得像亲人般热情。牟广丰看到，石碑